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五期 ——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6d)

【人物追踪】“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园 丁
【走向文革】我们是如何“革命”的？ ——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	程光炜
【史海钩沉】毛泽东“文革”后期“解放”和任用老干部情况简析	唐洲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追踪】

“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 园 丁 •

◇ 背景

1967年1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跨进了第二个年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造反派联合，夺了《文汇报》的领导权，接管了报社。5日，《解放日报》的领导权，也被夺到了造反派手中。随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指挥下，1月6日，造反派组织召开了“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公开打出夺权的旗号，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1月4日的北京，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三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刘志坚，被林彪、江青一伙抛了出来，罪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全军文革”由此改组，成立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江青担任了顾问。

与此同时，林彪任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管了刘志坚在总政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解放军报社发生了旨在夺权的“1·13事件”。1月13日的凌晨，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军报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引发了军报的夺权风暴。

稍后人们才知道，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生下的惟一女儿，时年26岁，到解放军报社任记者还不满3个月。

◇ 李讷为什么叫肖力，她是怎么到军报来的？

肖力的本名叫李讷。由李讷的名字改为肖力，则是始于“文革”初期。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赶上红卫兵大串联，她同当年的许多年轻学生一样，戴上红卫兵袖章也经常外出串联。江青对此很不放心，曾派戚本禹带军报一男一女两名年轻记者，扮成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外出寻找。在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的人海中，要把李讷找回谈何容易。到了1966年9月下旬，江青和陈伯达就亲自出面交代，要把李讷安排到解放军报工作。时任代总长的杨成武和解放军报的代理总编辑胡痴到钓鱼台领受的任务。三十多年之后，胡痴同志回忆：

那是1966年9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杨成武代总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交给你们负责，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作者注）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可是江青又说，对她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严，要发挥她的主动性。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接着，陈伯达说了些捧场的话，杨成武对李讷到军队来表示欢迎，我当然也同意。但我提出军报归总政管，此事应该通知总政肖华主任和刘志坚副主任。江青说，那就由杨代总长转告吧。离开钓鱼台回来的时候，杨成武又特意叮嘱我：李讷是主席的女儿，要好好帮助、照顾。这实际上也是我当时的主要心情。

这样，李讷就于1966年10月中旬改名肖力，踏进了解放军报的大门，穿上了绿军装，成了女记者，胡痴把她分配到快报组，并交代主持《快报》工作的宋琮直接管肖力的工作。

讲到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快报》和快报组的有关情况，因为它同后来发生的“1·13事件”关系极大。

所谓《快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创办的一种“绝密”等级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情况，仅供当时被称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领导阅批。当时编排的《快报》篇幅小（多是一事一报）、速度快、频率高，有时一个钟头出版多期。快报组的成员主要由军报的记者组成。开始由宋琮负责主持，宋琮调“中央文革”办事组后，则由和谷岩、栾保俊等5人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负责。

根据江青的叮嘱，李讷到军报工作，采取了保密措施，全社只有4个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快报组的众多记者只知其人，而不知她是何许人。肖力到报社不久，宋琮奉命调到“中央文革”任办事组组长，肖力的工作就由栾保俊直接管理。那时候，他同肖力的宿舍只有一壁之隔，不仅工作中经常见面，就是回到宿舍，也常见面。肖力会唱京戏，有时她一面漱洗，一面哼着青

衣花旦唱腔，非常乐观、爽朗。她用的皮箱是旧的，她说这是爸爸过去用过的。她说在中南海并不和爸爸一起吃饭，而是自己到大食堂里吃。她不仅不能坐爸爸的车，也不能坐别人的车，爸爸不允许。因此，她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下大雪，北风呼号，她要回家。栾保俊说：“你不要骑自行车了，我派车送你回去。”肖力赶紧阻止：“好叔叔，千万不要派车，爸爸知道是要批评的！”《快报》组的几位“好叔叔”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他们就在“1·13”事件中成了“阴谋小集团”成员，被李讷一网打尽了。

◇ 肖力为大字报找过江青

肖力要造反，早在1月初去京西煤矿搞调查时，就已经酝酿了。据陪同她一起去调查的同志回忆，那时候，她从广播和报纸上获悉《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经夺权，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她就说：我们回去也造反。

公开宣布要造反，则是在1月12日的下午。那时她从京西煤矿调查回来，向《快报》的领导小组作汇报。汇报会上，谈到下面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爱看《解放军报》了，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军报没有一篇关于路线斗争的文章，尽在那里搞什么“正面教育”。肖力说：“我们下去，人家听说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不感兴趣。”她的看法是：军报已经到了“严重关头”，要改变军报的面貌，“必须起来造反”。

据有人分析，这个汇报会实际上是肖力借汇报之机，向《快报》领导小组的成员们吹风。至于肖力这些论点的形成，是真的来源于对下边实际的调查，还是上边另有什么“精神”，这是至今也弄不清楚的一个谜。

当日晚，肖力组织到京西煤矿一同搞调查的两个人起草大字报。由她口授，边起草边议论，起草完大字报，已是深夜11点，肖力随即拿着大字报底稿，匆匆赶往钓鱼台，向她的妈妈江青禀报。

肖力决定要造反，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快报》领导小组当晚召开了会议，决定支持肖力造反。有人建议，此事应该向胡痴代总编报告。胡痴当时经常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也临时住在钓鱼台。于是，《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于当晚11点钟左右也来到了钓鱼台。

江青和肖力母女之间是怎么谈的，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谈完后，肖力来到宋琼处，向他征求对大字报的意见。宋琼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也在钓鱼台起居、办公。肖力来到他的办公室，就向宋琼念大字报底稿。这个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向胡痴汇报之后，吃过夜餐，回到宋琼处准备向他告别。宋琼向他们示意：“一起听听，提提意见。”

大字报可谓“气势磅礴”，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大“罪状”，却没有点胡痴的名，宋琼认为不妥。在他的建议下，增加了一句：“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 江青对胡痴说：要支持“小将们”

大字报没有点胡痴的名字，看来并非出于疏忽。那时候胡痴正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就在一周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会提名，经毛泽东正式批准，任命胡痴为新华社代理社长，同时还兼管《解放军报》。1月11日，也就是头一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审定改组后的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胡痴为新的“全军文革”成员，可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

再说直到1月13日凌晨1时，宋琼等人还在议论大字报，江青通知胡痴立即到15楼的会议室，有事要谈。宋琼便陪同前往。江青成竹在胸，她对胡痴说：“小将们要起来造反，你要坚决支持他们。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讨。”江青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态度还比较平静，声音也还算温和，但是讲得斩钉截铁。

江青又说：“军报同《文汇报》不一样，《文汇报》是上海旧市委领导的，军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而林副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造反只能在报社内部搞，不能像《文汇报》那样公开在报上搞。”

胡痴听了，当即表态说：“我一定支持他们造反，自己好好检讨。”从这次谈话来看，江青显然还不是要马上打倒胡痴。

从15楼会议室走出来之后，胡痴感到责任重大。凌晨过后，大字报一贴出来，点了四五个社领导的名，万一打趴下了，报纸出不来，他作为代理总编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正好还没有回去，于是就同他们一起商定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名单，预备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可以有一班人马出来负责报纸出版工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栽下了祸根，“预防万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名单，后来竟变成了“阴谋夺权”的罪证。

◇ 肖力的大字报：造反、夺权

1967年1月13日，寒风凛冽。

上班的编辑记者们一进解放军报社办公楼，就觉气氛异常，只见一楼大厅人头攒动，一张巨型大字报用绳子悬挂在一楼的大厅正当中。《解放军报向何处去？》8个字的大标题，用了斗大般的字，横排在大字报正文的上方，十分醒目。不用看正文，只看这标题，就可以估量出这张大字报的份量。

只见大字报在开头一段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了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1966年）6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歧途。”

接着，大字报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条“罪状”：

第一条是关于报纸宣传。大字报严厉斥责军报“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

第二条“罪状”是讲报社内部的运动。大字报说：“几个月来，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进而指出：“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第三条“罪状”是讲报社党委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冯征，说他是“彭德怀的吹鼓手”。因

为他曾随彭德怀出访，写过若干篇彭德怀的出国访问记。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总编室主任王焰，说他是“彭德怀的忠实走狗”。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王焰曾任彭办主任，“忠实走狗”由此而来。第三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张秋桥，说他“反对记者学习毛著，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许多揭发的大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吕梁，说他“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日常工作”。大字报还说：“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包庇下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大字报由此提出质问：“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如果这样下去，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击队”。这是“文革”以来在军报首次亮相的一个战斗队。后面排列了以“肖力”为首的八个人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6时半。

大字报上签名的8个人，多数是刚调军报不久的年轻人，有一大半不熟悉，对军报多数同志来说，为首的肖力，不仅没见过其面，连名字也都是陌生的。

◇ 另两张大字报：呼应肖力

匆匆地看完了这张大字报，走到办公楼的三楼，人们在最醒目的地方又看到了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起来造反》。大字报对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接着又用了一连串短促有力的句子，亮出了大字报的观点：

“必须起来造反！必须一反到底！”

“必须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必须砸碎一切与革命形势极不相称的官僚机构！”

“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报纸，必须由坚定的无产阶级掌权！”

“冯征、王焰滚开！”

“张秋桥、吕梁等同志，必须认真检查！”

“胡痴同志必须猛省！”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有9人签名。

另一张大字报紧贴在这张大字报的旁边，标题是《特急呼吁》，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并宣称“从今天起，报纸由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左派来办”。署名是以胡学方为首的“金猴战斗队”。胡学方是军报记者，他并没有参加钓鱼台1月12日晚的活动，只因能写一笔好字，临时把他拉来抄写大字报，就冒冒失失地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后又依据栾保俊透露的要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的秘闻，抢先以“金猴战斗队”的名义写出了这张大字报。

◇ 三张大字报起初引出的是愤怒

但是，这三张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并没有出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局面。

如果说，当人们在一楼大厅看“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的时候，还是不动声色的话，那么，看了后两张大字报之后，谴责之声立刻不绝于耳，愤怒之火就像乾柴烈火一样燃烧起来。整个编辑部三五成群，议论纷纷。锋芒所向，直指“革命到底造反纵队”，斥责这帮人要干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效果呢？

第一，三张大字报的基本主张是要效法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做法，造军报的反，夺军报的权。对这一点，就编辑部的大多数人而言，当时还是接受不了的，由此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第二，大字报虽然点了军报五个领导人的名，但主要是指向副总编冯征和总编室主任王焰，说他们是“彭德怀的吹鼓手”和“忠实走狗”，显然是要打倒的对象。这也引起大多数人的强烈反感。

第三，最重要的，肖力这时候还没有公开亮相，人们也不知道起草这3张大字报的内幕，当时有些人虽然知道肖力等8个人是参加《快报》工作的，但是都没有予以重视，因为他们大多是刚调军报不久的“小字辈”，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却多是资深的“老家伙”，又是主持《快报》工作的领导。所以，有些人猜测，这3张大字报很可能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几个主要成员一手导演的。编辑部当时的谴责之声，直指“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盖源于此。由于这些人同胡痴的关系密切，于是有些人又猜测胡痴很可能是幕后的总策划者，搞了一个“胡夺胡权”的闹剧。

后来人们才获悉，“革命造反突击队”为首的那位肖力，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

◇ 风云突变：肖力亮相了

对于编辑部爆发出来的这种群情激愤的怒涛，肖力当时是否感到突如其来？是否曾同她的队员们紧急磋商，分析局势，商量对策？局外人都不得而知。由于当时都还不知道其真实身份，所以她也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时只有一个人从细微处感到肖力有了一点变化，他就是被肖力称作“好叔叔”的“革命到底造反纵队”主要成员栾保俊。

栾保俊当时觉得局势严重，他们已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就去找肖力商量。谁知肖力对他非常冷淡，只冷冷地说了几句话，没有深谈，往日称他为“好叔叔”的那股热乎劲，一点也没有了。栾保俊觉得不对劲，不知肖力为什么这么冷淡。

下午，军报办公大楼五楼的大会议室，人头攒动，喊声一片。人们正在质问“金猴战斗队”的胡学方，要他交代题为《特急呼吁》的那张大字报，呼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是怎么炮制出来的？！有人抢话筒，有人站在凳子上大喊大叫。

这时候，胡痴来到会场。他上午正在出席中央召开的一个会，接到了肖力的电话，问他不能回报社？中午，又接到了栾保俊的电话，说是报社同时贴出了3张大字报，报社的形势有点乱，要他下午回报社看一看。当他一进五楼的大会议室，立刻成为大会的质问对象，让他站在那里，质问他同时贴出的这3张大字报，搞的是什么“阴谋”？胡痴镇定地作了回答。他说，头两张大字报要造反，我知道，我都表示支持，但是都没见过原稿；第三张大字报我不知道，我没有搞什么阴谋。

这时候，肖力首次亮相了，当时大部份人仍然还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也就毫不客气地要她回答写大字报的经过。只见她从容不迫地站出来说：“我们革命造反突击队同他们没有关系，根本是两码事。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3张大字报，在内容上相互呼应，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明明是“一码事”，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根本是两码事？”但是她讲得不像是辩解，倒很像真是对那两张大字报也存在着迷惑不解，这使得不少头

脑稍微冷静的人感到有点蹊跷。一直到了这天的晚上，人们从新贴的两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中，才看出了一点端倪。

那是这一天的“质问会”结束之后，在办公大楼贴出了一张题为《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对下午的“质问会”提出斥责。大字报认为，下午的会“极不民主，极不平等”，“只兴自己讲，不许别人说”，“蛮横地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大字报严正声明，下午的大会“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大字报的落款把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排在首位，然后依次是：“革命到底造反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战斗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

这张由6个战斗队联名的大字报，是由哪一个战斗队发起、怎么串联的，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是，过了不久，人们听说，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征得“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同意，便冒然地在大字报上署上了他们的名，并且在第一位，这使肖力大为恼火。这显然是打着她的旗号搞名堂。于是，当晚10点钟，“革命造反突击队”就在三楼最显著的地方，贴出了题为《强烈抗议》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和《严正声明》的调子截然相反，劈头就说：“今天的会是一个革命的会，造反的会。报社革命群众开始起来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军报社乱了，乱得好，好得很！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大字报笔锋一转，“但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战斗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等组织，却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法，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在他们的所谓《严正声明》上签了我们的名。对此，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呼吁全体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我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

这张大字报立刻成为编辑部关注的焦点。它用张贴大字报的实际行动，向报社广大群众宣告：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确确实实“没有关系”，地地道道是“两码事”。

这张大字报一出，形势大变。第一张题为《火烧胡痴》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大字报声称，“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玩弄的夺权阴谋，完全是胡痴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报社革命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是“一个阴谋”。大字报的落款是：“井冈山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红彤彤战斗队”。这张大字报一出，栾保俊感到形势不妙，就同快报领导的一班人乘车到钓鱼台，同宋琼商量对策去了。

就在此时此刻，人们才开始知道，肖力原来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

◇ 旧班子的人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是在“三忠于”、“四无限”和“红海洋”中走过来的，现在，毛主席的亲人率领一支“革命造反突击队”，正在自己身边造反，由此激起人们心灵上的感情波涛，那是无与伦比的。于是，报社的阵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用政治术语来说，叫作大分化、大改组。

那时候编辑部的夜晚灯火辉煌，通宵达旦。有些人是在“抓革命”，还有不少的人是在“促生产”（编报）。1月13日的这天夜晚，照例如此。已经公开亮相的肖力，在这一天的夜晚，开始到一些办公室走动，同一些人交谈，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

这时候，有人提出，应当把宋琼、栾保俊那伙人从钓鱼台揪回来，请肖力同“中央文革”联系一下。肖力回答说，不需要我联系，如果你们行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话，我相信，“中

中央文革”是会支持的。于是，一辆大轿车从军报驶向了钓鱼台，这已是1月14日的凌晨。钓鱼台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是一个禁区，一般人不得入内，当时，栾保俊等一班人可能有一种心态，认为钓鱼台是他们的“避风港”，只要进入那里，是谁也不敢侵犯的。谁知，这辆大轿车来到钓鱼台，同传达室一联系，居然顺利地把他们揪了回来。

临行前，宋琼悄悄对栾保俊说，江青接见了他们，要他们回报社参加运动，并关照不要和群众对立。由此不难看出，把宋琼等人揪回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实际上也是江青同肖力早已商定好了的。

宋琼、栾保俊等被从钓鱼台揪回来之后，就被集中在办公楼的一楼一间房子里，席地而坐，席地而睡。从此，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上签名的9个人，连同大字报都没有看过更没在上面签名的胡痴，都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 风云突变之谜

肖力要造军报的反，乃至对大字报修改、定稿，都是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进行过磋商的；平时她对他们也非常尊重，视他们为长辈，称他们为“好叔叔”。而这些“好叔叔”们对肖力的造反行动，又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肖力在“质问会”上为什么会突然宣布同他们“根本是两码事”，并由此令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曾是很多人迷惑不解、众说纷纭的话题。

当年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栾保俊，是这么说的：

肖力姑娘的风云突变，对我来讲，一直是个谜，至今也找不到把门打开的钥匙。“1·13事件”之后，我想找肖力姑娘谈谈，了解一下内情，遗憾的是，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见到她，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在“1·13”之前，胡痴、宋琼都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而我们办《快报》，又曾多次受到表扬。在这种情况下，肖力姑娘给予我们一定程度的信任，必是真诚的，决不会是伪装。但是，她毕竟是伟大领袖的女儿，有气魄，有胆量，非普通女性可比；而长期以来变幻无常的政治斗争，也不会不在她的心灵中打上烙印。当她认为，我们这班人可以作为改变军报面貌的使用力量时，自然会利用我们一道前进；但当她感到和我们在一起不利于发动群众时，自然也会弃之如同敝屣。在她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只会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决不会是这一个人或那一群人的命运。这就叫“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是没有情义可谈的！

对肖力的风云突变，当时还有一种传闻，说是江青在钓鱼台看了军报3张大字报的抄件，认为第一张和第二张都没问题，看到“金猴战斗队”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那张大字报时，脸色突变，把手一拍说：“这张大字报有问题！”由此导致了军报运动的风云突变。

“金猴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问题究竟在哪里？当时不少人进行过猜测，有一种说法认为，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是要放一把火，揭军报阶级斗争的盖子，而“金猴战斗队”提出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干扰了这个战略部署，由此被看作是捂盖子。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金猴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透露了一个信息，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而这个班子的名单里却没有肖力，这就埋下了祸根。江青闻报，当然不能容忍，认为这一帮子人，是打着支持肖力造反的旗号，实际上是乘机来“摘桃子”，另搞一套。这

样，肖力也就能在那个“质问会”上，坦然地回答说：“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位当年参加过“革命造反突击队”后来又分裂出去的同志认为，上面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是最关键之点。他说，肖力对报社有一个基本看法，认为“旧势力太严重”，凡是在军报工作多年的，她都看作是什么“三朝元老、旧班底、旧势力”。她认为，在军报有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造反就是要彻底挖掉这条黑线。“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那一班人，虽然支持了她的造反行动，成为她暂时的同盟军，但在骨子里，她同样把他们看作是“旧势力”。形势一变，说翻脸就翻脸。她相信和依靠的，是刚调报社不久、同报社没有什么瓜葛、而且调子高的年轻人。当初成立“革命造反突击队”，其成员也都符合这个标准。即使对这样的人，她也不断地“吐故纳新”，其中有两个人后来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两个人被隔离审查，所以后来她又重新组建了“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她是极其真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直气壮地在军报造反夺权的。

◇ 林彪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

夺权风暴席卷军报的当日晚上，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在“三座门”接见了军报的几位领导和群众代表，就“1·13事件”，听取大家的看法。

发言结束后，肖华开始讲话。其要点，一是对胡痴要“一烧二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份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军委审批。

事隔两天之后的1月17日，人们从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中，才知道，对胡痴，林彪不是像肖华那样要“一烧二保”，而是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对报社的局势，也不是像肖华要求的那样“要稳定，不能乱”，而是“‘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在这种局势下，又怎么能像肖华那样，立即成立军报新的领导班子呢！不仅如此，过了不久，肖华本人也被打入了另册。在江青的指挥下，打倒肖华的大标语上了街，肖华的家被抄，肖华开始被批斗。这是后话。

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高度赞扬了由肖力等人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林彪在信中说：

“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做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评论，送中央文革

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劝说学生和其他机关的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毛泽东同日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据了解内情的人士后来透露，林彪的这封信，是出自关锋之手。1月14日下午，关锋和叶群奉林彪、江青之命，来到军报调查。所谓“调查”，只不过是同肖力和她的队员们在三楼的小会议室里密谈。局外人不得入内，交谈的内容也秘而不宣。

多年之后，人们才从了解内情的人士那里获悉，在这个小会上，肖力和她的队员们，侧重阐述他们那张大字报的观点，诸如报纸在宣传上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尽在那里搞什么“正面教育”呀；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而发表的社论，调子太低，是官样文章呀；报纸的实际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左派手里呀，等等。至于不能公开在报上发表“革命造反宣言和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却是关锋首先讲出来的。他当时的原话是：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政变社论”，也不能发“羞羞答答的政变社论”。后来形成文字，落实到林彪的信上，就无中生有地栽到了胡痴等人的头上，变成了“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一个阴谋”。

在那个“以言代法”和“权大于法”的年代，“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的这封信，加上毛泽东的具有最高权威的批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法”。无须乎调查取证，也无须乎听取什么申辩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胡痴、和谷岩、宋琼、栾保俊等，就以“胡痴小集团阴谋夺权”的奇冤大罪，押送北京卫戍区关了起来。一个以“1·13事件”为主体的“胡痴阴谋小集团”的冤案由此铸成。

经毛泽东批示的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下达军报之后，当然还是一片拥护之声。肖力由此也就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拥戴为群众领袖，服服贴贴、心甘情愿地听从由她率领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指挥。肖力的倾向乃至只言片语，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了人们的指路标。军报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其特点，后来有人把它概括为五个“一”，即：一队（革命造反突击队）专政；一个人说了算；一张大字报定调子；所有战斗队都是一边倒；全报社只有一种声音。

◇ 肖力走上神坛

肖力在军报刚刚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后，曾在全社大会上讲过几句话。她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有了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她还用了当年“文革”的流行语言说，对她“炮打”、“火烧”都可以。大家感到很亲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13事件”之后，她那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和经毛泽东批示的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很快许多红卫兵小报全文刊载，于是肖力的名字也就随伟大领袖的批示和副统帅的信而传遍全军、全国。人们也由此获悉肖力与李讷实为一人。肖力也就成为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

对肖力的颂扬也开始升温。

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全国所有单位的办公室乃至宿舍都挂有毛泽东的像，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具有军报特色的是，在毛泽东像的两侧，还有两帧条幅，一帧书“向肖力同志学习”，一帧书“向肖力同志致敬”。条幅均用红纸，每个办公室无一例外，非常醒目。后来，发展到有些家庭宿舍也照此办理。

开会发言，不论是大会小会，言必称肖力，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并且都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

“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的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一类提法和口号，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稿上。

身为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吴法宪，在这种“大树特树”的热潮中，自然不肯放弃讨好江青的大好时机。他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军报下达了“指示”：“在全国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现行反革命，在军报反对肖力同志的也是现行反革命！”由此，“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仅成为开会（特别是批斗大会）必呼的重要口号，而且成为军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后来受迫害被揪出来专政的一大批编辑、记者、中层干部和报社领导，其中不少都戴有“反肖力”的大帽子。这是后话。

肖力由此走上了神坛，那个声言要“向叔叔阿姨学习”的年轻姑娘，竟成为军报至高无上的权威。

此后，判别是非的标准，都以肖力的口径为标准。

此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胆战心惊，谨小慎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指向哪里，打到哪里，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简言之，从1967年1月13日到同年8月23日，肖力率领“革命造反突击队”和后来改组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1968年，跟随她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经过无限上纲炮制了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案”。这些案件涉及数十人，其中有的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的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监督劳动；有的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除此之外，还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目下，揪出了一大批名目繁多的“牛鬼蛇神”，统统被撕掉领章帽徽，关进“牛棚”。还有以办“学习班”为名，将一大批编辑记者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

上述各项人数相加，占军报当时干部总人数的60%以上，其中两届社一级领导班子除刚从部队调来的一人外，无一幸免，中层领导干部除少数外也大都揪，把军报搞得人仰马翻。

这一系列斗争开展得惊心动魄，其“胜利”的取得说穿了也简单，一是靠个人迷信，或曰“打旗号”：“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这一招确实威力无比，它使人们盲目相信“革命造反突击队”是绝对正确的，不敢有丝毫怀疑。二是靠专制：“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一手更厉害，不用说反对，稍有怀疑或非议，就能打成现行反革命，谁还敢出来唱对台戏呢！

后来，肖力已经毛主席决定调离报社，并正式公布了，其余的几位“小将”，依然打着肖力的旗号，动辄说“这是肖力决定的”，“这是肖力指示的”，于是，依然所向披靡，畅行无阻。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为止。

回顾李讷在“文革”初的这些往事，不是要纠缠历史老帐，更不是要揭她的“伤疤”。从历史的全局看问题，说句公道话，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给军报带来的灾难简单地归之于李讷一个人。当然，由于她那不能自己选择的独特身份，在“文革”中又确实起到了一般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这同那个狂热年代个人崇拜的盛行、封建主义的影响分不开，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李讷。本文将李讷在“文革”初的活动作为一条贯穿线，正是试图揭示那个狂热年代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恶果。

□ 原载《南方周末》1999年2月12日

【走向文革】

我们是如何“革命”的？
——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

• 程光炜 •

20世纪的后50年刚刚过去，它带走的还有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历史。对1949—1959年间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和政治教育当然是人生教育系统中相当重要的部份，然而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一生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重大影响和规范作用的，应该是对50—70年代革命历史文学的阅读。在对解放后出生的这代青年实施的庞大和革命化的教育工程中，文学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项目，它形像化的功能，和当代性、青年性的特征，却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人的人生选择，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检讨一代人文学阅读的历史，也许其意义并不亚于对一个时代的检讨，因为，它毕竟包蕴了一代人人成长和思想寻求的全部隐密。

一、文学工程的启动及其运作

任何一个社会合法性的确立，首要的目标就是如何吸引和征服青年。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和军事上打倒了国民党，但在领导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上，这种斗争仍然处于长期继续和深入的状态。40年代末期，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成为推翻“三座大山”历史变革中的革命洪流；跨入新的时代后，社会问题和尖锐的历史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马上得以缓解和解决。因此，如何把“革命洪流”引导和转变为革命大厦的“基础”，就成为中共领导人优先与迫切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我们必须“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保证这一文化战略的具体实施，《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原本部所属之新华通讯社已改为国家

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处已改为广播事业局，均隶属于新闻总署。本部所属之电影管理局，已改为电影局，隶属于文化部。在出版总署下成立了出版局，原本部所属之出版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应即取消。新华书店改为国家书店，受出版总署的领导。除了上述组织已改属政府以外，全国的文化教育的行政工作，此后均应经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第5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名义下，上述调整不仅有利于文学工程的快速启动和实现高效率，而且使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广泛的道义基础。50、60年代的文学生产和价值追求，对“艺术标准”一直表现得比较冷漠，小说的叙事、诗歌的抒情及其它文学样式审美形态的设计，只不过是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的确认，它孜孜以求并一再强化的主要是对广大青年读者的“教育”功能。1949—1976年的17年间，先后有大批文学作品问世：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刚》（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欧阳海之歌》（金敬迈，1965）、《艳阳天》（浩然，1964—1971）、《虹南作战史》（集体创作，1972）等，诗集有《投入火热的斗争》（郭小川，1956）、《雷锋之歌》（贺敬之，1963）；文革时期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平原游击队》、《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它们的现实意义，正如邵荃麟所指出的：这些作品“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注：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学十年》第37页，作家出版社，1960。）后来，有人也指出：“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形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文学生产指导者、作者和作品的“主要目的”。（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但对历史“本质”的叙事还必须通过读者这个环节，与后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交流，它才不至于沦为空头大论：另外，社会获得合法性的前提之一，是使文学对历史的叙述获得合法性，也即所谓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走进青年心灵并得到道义支持的根本途径。为实现这一效果，50—70年代文学的触目表现是它为提高文学作品的革命主体性而依赖于对其的不断“修改”和“再版”。《保卫延安》在初版之后，作者把1947年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彭德怀退出的主要线索修改为：我军将士在青化砭、蟠龙镇和沙家店等战役中，始终保持着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从而摆脱了生活的真实赢得了艺术的真实。《红岩》的第二稿本来“既未掌握长篇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经过共青团中央、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一再启发、指点和讨论，第四稿的《红岩》终于“找到了高昂的基调”，“人物也就从而变得更崇高、更伟大了”，整个作品的面目“焕然一新”。（注：马识途：《且说〈红岩〉》，《中国青年》1962年第11期。）杨沫的《青春之歌》之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她克服了“知识分子情绪”，而把30年代青年的人生选择与中国革命的价值追求紧密地联系起来。据该书的《再版后记》所述，作品问世后一时好评如潮，但也遭到《中国青年》和《文艺报》的酷评：一是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二是“林道静和工农结合的问题”；三是对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描写过于薄弱，等等。（注：参见1960年修订版《青春之歌》。）因此，为服从人物形像描写“更概括、更集中”的创作原则，作者不惜增加了在小说结构上明显糟糕、别扭的林道静在农村的第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第三章。但经过这种牺牲艺术规律性而成全革命光辉性的“修改”，历史的“本质”反倒突出和高大了起来。

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对文学艺术包含的社会意义的判断，他说，文学是一件工艺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也认为，艺术虽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它无疑是与上层建筑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份。在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阐释中获得权威话语的布莱希特，更倾向于从文学作品（演员）与读者（观众）的“距离效果”中解释这一令人着迷的阅读现象。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任务不是“反映”一个既定的现实，而是为了表明人物和行动如何历史地产生。文学成了一种实验，用演出效果回过头来验证自己事先的设想：它本身并不完整，甚至也不完美，加上读者（观众）的反应才算完整和完美。

二、另一种记忆的形成

在1999年出版的丛书《日常中国》中，我们读到了一代人对50—70年代十分有趣的“记忆”。钱理群回忆说：“当时到处在进行‘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学校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每一次有一个中心主题，把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统一起来。例如，‘爱祖国周’等等，‘我们是新中国的小主人公，少儿队是我们自己的组织’，这种主人翁感，是建国初期的时代情绪，今天回味那处处以‘小主人’自居的劲头，仍怦然心动。”（注：钱理群的年龄段不在我们考察的历史范围，但他的精神状态仍属于这一时段。

《五爱》、《主人翁》两篇文章均出自《日常中国——5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余华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又说：“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能够看到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了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注：余华：《阅读》、《音乐课》，文见《日常中国——7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单是小说、诗歌、音乐，而且电影、舞剧也深深渗透到那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莫言、陈村、孙甘露等人都曾谈到后者这种更为形像和直接的形式对他们心灵世界的震撼和影响。除注意到文学艺术作品对当时青年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人格培养之外，蔡翔还把回忆延伸到文革这一更复杂和多层面的时间领域。他说：“我们对革命仍然很关心，经常传播各种马路消息，尤其是‘武斗’，常常刺激起我们潜在的浪漫。”认为当时“尚武”之风在青少年中的盛行，以及“武斗”情结的深层积淀，与时代氛围、文学阅读和人格的畸形发展等等因素，都不无深刻的关联。（注：以上都出自《日常中国——60、7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蔡翔：《少年》，文见《日常中国——6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讲述”在今天实际是一种“再叙述”。不过，再叙述真实揭示了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轨迹（它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有颇富意味的呼应和回声）。事实上，再叙述不仅与50—70年代的文学战略，也与文学艺术作品的生产者之一的作者在共同进行着历史的“合谋”。人们注意到，作家们在当时的创作中普遍都带着强烈而自觉的政治功利性。杨沫在谈到《青春之歌》的创作时坦然承认：“如果这部小说真能让青年同志看看过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斗争过来的，也许他们对今天的新社会、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会更珍爱一些，——而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最高愿望了。”并形像地为自己一再改书辩解道：“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可以比作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母亲不但要孕育、生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把他教育成人，让他能够为人民为祖国有所贡献，做一个有用之材。假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了毛病、缺点，做母亲的首先要严格地纠正他，要帮他走上正确的道路。”（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雪克表示，他之所以要写《战斗的青春》，目的是要“表现出敌、我力量的消长转化”，从而表现出抗日力量“从战斗到挫折，到再战斗，到胜利的反复性”。为什么要“重写”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红日》作者吴强的明确回答是：“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费了一些笔墨。”（注：雪克：《讨论〈战斗的青春〉给我的启

发》，吴强：《红日·修订本序言》，两文均转引自张钟等《当代中国文学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这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再叙述”，和一代人对50—70年代的再叙述一样，它强调的是与革命历史传统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同时也意在强调自己精神成长的特殊性。

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包含了对现代性的选择，但最终导致的不是现代性的重建而是它的中断。尽管它声言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然而所偏离的正好是理性、自由、民主、科学，与整个人类对话和交流等现代性的目标。“50—70年代文学”完全是在世界文明史、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一种写作，它以“革命”的名义对现代和传统做了事实上的否定。五四文学充份展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消失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失去了支撑，当然也在公众生活中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合法性。所谓的“传统”也只剩下“革命传统”。所有的“记忆”被关闭了，50—70年代的中国唯有对“革命战争”及其“历史”的记忆。在此基础上，充满政治文化色彩的“另一种记忆”诞生了。可以说，1949—195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正是被“革命历史传统”缔造的一代人，50—70年代文学正是为当代中国读者营造和提供了革命这“另一种记忆”的一种文学。

正如有人指出的：“在当时，没有看过这些影片的城市人，几乎是没的。它已经不再是影片，而是某某路线的伟大胜利和一堂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注：陈村：《看电影》，参见《日常中国——7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实，当时的文艺出版发行、电影戏剧的创作演出等等，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设计和制定的。不仅是前面作家的公开声言，连文艺界的权威领导人也不打算隐讳这一意图。1950年初，茅盾在《人民文学》举办的“创作座谈会”上，率先提出了文艺如何积极配合政治任务和政策宣传的问题。他认为，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既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当然最好。但常常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上差一些。”号召作家以“赶任务”为光荣。（注：茅盾：《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报》一卷九期，1950。）40年代，周扬在分析一篇小说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时指出，是因为它的“教育意义”没有发挥出来；为此他概括说，教育意义决定文学作品的成败。50年代末，为维护上述“功能”的政治权威性，他又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具体指示有关文化出版部门说：“要扩大社会主义，就要缩小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三、文学题材的限制和归类

对文学阅读的规范与控制还渗透到中、小学和大学的课程当中。本着“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大大小小的课堂自然成为文学“革命化教育”的重中之重。但革命化教育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必须通过重新摆正新教育体制与旧教育体制、人生价值与传统文化理念、人才培养与政治教育化等等的关系，使之具体化，制度化。它必须与旧的时代严格区别开来。

1942年，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和朱自清两位教授曾就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课程中的比重问题发生过争执。罗常培主张中文系应该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主要方向，朱自清则认为：“研读古文”，“为的便于了解和运用古代文学遗产”，“但这绝不是中文系的唯一目标”。两先生的争论是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的，显示的只是在处理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关系时考察角度的差异。正如有人在评价这一代人的文化心态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都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传人，身上都流着‘五四’的血”，像现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始终是以“守护真理与良知、坚持价值与理想自任的”。（注：参见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第85—9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建国后中、小学和大学文科教材的编选优先考虑的，刚好是另一个价值观问题。1962

年11月，周扬亲自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纲要》讨论会，对有关人员做了重要指示。他在讲话中一共谈了怎样写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的线索、对左联的估价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等五个问题，但都是围绕如何“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一命题而展开的；这些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中、小学教材）史学观的形成和研究、教学的方向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50—70年代各种文科课本一直是按照歌颂中国革命和控拆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来设计、编写和讲授的。在文学题材的限定和归类上，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封建糟粕”的东西，基本采取的都是排斥的态度；即使有某些作品选入，也是以歌颂劳动人民反抗地主压迫和农民战争的内容作为思想的标准。在此情况下，中外文化的遗产很难再进入这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与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建设处于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二是反映中共领导的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小说、散文等文体，占据了文科课文的主导地位，从而也进入了大、中、小学生的思想、精神和气质培养的全部过程之中。它们以“红色经典”的姿态，成为各类学生人生成长中的“偶像”和“榜样”。在这个意义上，新的革命传统代替了过去的传统，重建起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并成为广大青少年精神世界中最大和唯一的“内存”、三是左翼作家比如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作品，入选原因即在于他们反抗和姿态吻合了中共当时被压抑的“非主流”的地位和心境，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当代激进主义文艺思想本来就属于同一知识谱系，享用着同一个文化资源。另外，载入当代文科教科书的文章和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颂扬中国革命历史和老革命家胸襟的文字，例如杨得志的《大渡河》、王愿坚的《七根火柴》、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另一类是反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例如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论“打落水狗”》和《“雷峰塔”的倒塌》，茅盾的《白杨礼赞》，殷夫的《别了，哥哥》，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等等。

关于文学题材的讨论可以一直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但更需要深究的是当代文科教科书所呈现出来的“当代化”的两种文化心态：即战争的心态和仇恨的心态。前者把人们的精神世界纳入紧张的、服从性的和崇尚集体而排斥个人的状态之中，它把战争年代中形成的政治军事思维、行为模式植入和平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把“战争文化”奉为最高的权威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后者反对爱而歌颂恨，向往一种惊涛骇浪般的文化胸襟和人文处境，同时它把激进和单向度的人格标准置于人生的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之上。它以和“旧传统”彻底决裂的姿态，为解放后各种文科课本的编辑策略提供了思想武器，也提供了一种逻辑。红卫兵全国“串联”的场面，无异于《七根火柴》精神在60年代的“重现”。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知青日记”，更是“形像化”地记述了一代人精神追求的历史过程。（注：文革后期盛行一时的中外战争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闪闪的红星》对青少年思想生活的影响，将会在另外场合加以考察。）

课本的“改写”完成了对传统文化当然包括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剥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思想启蒙的主题迅速退缩乃至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思想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流话语。战争和仇恨的哲学因此不仅合法地建筑在坚固的思想温床之上，而且在广大的民间获得了丰厚的土壤。在当代社会的前半期，青少年精神状态的“非知识分子”和“走向民间”构成了势不可挡的两大潮流，藉此也形成20世纪中国青年史中曾有前例但绝无这般“极端”的现象和走势。不过，需要甄别的是战争文化中健康、向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由战争所孕育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正常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愚民政策两者的思想界限。对于前者，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加以弘扬的。

四、在红卫兵运动和“伤痕文学”中的延伸

考察文学作品对一代人精神生活的影响，红卫兵运动和“伤痕文学”无疑是两个不能忽视的案例。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对这代青年精神状态的“最集中、最典型和最形像”的概括，

而且通过它们，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印证 50—70 年代文学的审美性格和思想趋向，发现二者之间某种共时性的特征。当然，检讨包括自己在内的同代青年的精神世界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人们对曾经深信不疑的真理展开质疑，又把激情岁月纳入到学理之中的时候更是如此。

红卫兵运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兴起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既有全球范围内左翼文化的深刻根源，又是当代中国激进主义文化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它既是本土化“平均主义”观念和俄国民粹思想的充份膨胀与体现，同时又预言了现代化的全面危机。由政治权威发动的波及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为这代青年提供了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平台”。“等着我们的捷报吧，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誓死作千秋雄鬼不还家！（吴强：《放开我，妈妈！》）“听！/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颂，/‘战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红卫兵万岁》）“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因为我们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士》）显然，我们不能把这场运动的重要成果的“红卫兵文学”看成是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和断裂。重视红卫兵文学“革命性”和“先锋性”的特征，意图恰恰是要强调它与建国后文学实践的精神联系和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

“忠孝不能两全”的离家“出走”模式，曾贯穿在五四学生运动直到 30、40 年代青年运动的始末。以同旧传统（包括旧家庭）“断裂”的方式参与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曾经是几代中国青年的人生目标和基本走向。《青春之歌》是这样描写林道静对革命的向往的：“想到一个久压在心头的问题，道静的心跳得更快了，她抑制住自己，抵声地问，‘请你告诉我——你是共产党员吗？’”而江华的回答是：“你会懂得考验这两个字的意思。你从生活里考验了党，考验了革命；可是，革命也要考验你的……道静，你要经得起考验，党是会给你打开大门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以党为家，以革命为家，和以天下为家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生观，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生死观。革命烈士许云峰临刑前的著名“自白”，曾经那样激动过 60 年代广大青年读者的心弦，他说：“这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受尽旧社会的折磨、迫害，终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使反动派害怕的人。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红岩》）时间相隔不过 2、30 年，然而两个时代的人们所遵循的是如此相似的思想逻辑，和人生的轨迹——都在时代关口选择了死而放弃了生，选择了思想和诗意而放弃了生活的庸常性。

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文学就是生活本身。因为文学比生活站得更高，文学最典型和集中地概括了生活，它创造了生活火一般的性格。这样的文学在本质上是反对布莱希特那种保持“审视距离”的文学观的，它充满高昂革命斗志和激情的人文品质，肯定会反感冷淡和疏离现实的态度。正像席卷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孕育了红卫兵文学一样，1976 年春的“天安门事件”，也成为培育“伤痕文学”的直接的思想温床。有人指出：伤痕文学的“创作仍然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其中的一些创作仍然是意识形态话语”，这是因为，“‘文革文学’的阴影与消极面仍然存在于新时期文学之中，这不仅表现为‘文革文学’某种方式的惯性‘运动’，还表现在长期的‘心理’暴力对作家的禁锢；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有学术政治化的现象，而一些人还习惯运用‘大批判’的方式。”（注：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和研究》，《'99 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9。）这固然是对不同历史时段文学复杂关系的一个判断，有意思的，是它从连续不断的文学史运动中提取了一个观察的视角。这个视角即观察一代人精神发展的内在延续性和共时性。

从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小河那边》、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小说，到北岛的诗《宣

告》、《结局或开始》和遇罗锦的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再到前期知青文学等“伤痕文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极其触目的时代性字眼：“伤痕”。伤痕顾名思义是在表明文革给广大青年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有它对50—70年代思想方式的继承与沿用。北岛在短诗《回答》中宣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江河在《纪念碑》中也写道：“真理就把诅咒没有完成的/留给了枪/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帜/留给风，留给自由的空气/那么/斗争就是我的主题”。而刘心武的《班主任》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社会“问题”。他在谈到创作这篇小说的体会时说，“严肃地从生活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生活”，是自己创作的唯一准则。（注：刘心武：《生活的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在这里，50—70年代的文学教育继续在组织着作家们的文学思维和对生活的叙事，他们仍然在用偏重夸张的战争文化视角介入人物的情感世界，用仇恨的文化心态及哲学标准来评价生活的是非。准确地说，他们是用“革命的方式”来反省“革命的错误”。不同只是，“文革后”和“文革前”在时间观念上是历时的，而它们在精神状态上却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共时的特征。

红卫兵运动和伤痕文学绝不等于只是共和国的历史，它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像有的人所说，我们是被革命喂养大的一代人。（注：戴锦华语。）正是与我们的生命一起成长的文学的阅读，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理想的人生。所以，前面所述的两种现象尽管发生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但它无疑得益于在此之前文学教育的成功实践。“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虽然在今天，人们姑且称其为悲剧。

五、革命文学遗产问题

能否冷静地客观地认识50—70年代文学，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也关系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国现代化选择的问题。在这个目前尚属“敏感”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非历史化”的文学倾向，持这一观点的人始终在用现代化追求的“误区”等流行意见来批评对文学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因此，与此相关的文学史著作努力贬低或根本忽视这段历史；另一种正好与之相反，作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强烈反弹，他们更愿意在“怀旧”的心理中重温历史的激情，甚至表现出对革命时代价值观的简单认同。对这段文学的理解显然与个人的精神背景有关，人们与自己所“亲历”的时代毕竟仅仅有不足30年的历史距离。

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革命是“以暴易暴”的历史产物。如果理解了一个现代政党对另一个现代政党28年的残酷镇压，理解了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之后才迎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就很容易理解上述的政治结论；也比较能够抱着“历史的同情”的态度，去看待当代中国文学对“革命遗产”而不仅仅对“五四遗产”，对集体主义而非对个人主义的价值选择。

1949—1959年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产物。他们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时，也非常自然地接受了鲜红而丰富的革命传统。他们成长的历史，也就被纳入到新中国宏大的文学工程当中。“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

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这时代的箴言实际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革命的目标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与传统的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而文学，则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所以杰姆逊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对叙事中的象征意义的习以为常的理解”，因为它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为此他提醒人们说：“如果我们要理解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们所起的具体的历史作用的话，我们必须在这种文化革命的语境之中来看待他们的成就和失败。”（注：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引自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韦伯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强调“合理性”的。他认为，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指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卡里斯马式行动都有“非常态”、革命的性质，因而可以成为打破传统习惯、推动理性化进程的动力；工具合理性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这种行动符合人们理性思维的常态。但反之，由于行动只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势必会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的存在。因此，“合理性和非理性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一个现实的行动都含有这两者的因素。人们力求通过合理性行动使世界从巫术迷信中解放出来时，殊不知在这理性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也渗透其中。”（注：苏国勋：《理性化及限制——韦伯思想引论》第89—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即将成为一页掀过去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曾经“喂养过”我们的50—70年代文学实际已经变成了一份革命文学遗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不再以简单否定或赞成的态度，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属于自己的这段“历史”。首先，从第三世界的“语境”，尤其是从处于现代化矛盾与选择之中的百年中国的历史发展看，无论我们对时代的选择还是时代对我们的选择，都是痛苦的，然而都含有必然的“合理性”。在价值观上否定50—70年代文学及其对一代人精神的影响不能代替对这段文学史的认识——一段历史的价值不仅在它的历史范围之内，而且还在它从反人类和反人性的本质上给后代另外一种精神的启示和财富。其次，在“正常”的社会处境中，人们难以在情感和理智上接受“非正常”的历史，尤其缺乏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互动的理论、方法、视野和胸襟。这样，就需要对一代人的“50—70年代文学阅读活动”做历史的深广度地包容，而且做学理的提升。至今为止，我国的当代思想史、文学史始终奇缺的是对“同代人”精神状态史的研究，那种能够启示人做深远思考和想象的研究成果更是处于“缺席”的状态。令人极其遗憾的不是一代人的历史行将成为“过去”，而是对它的深刻剖析和记录将成为一段“空白”。最后，我不主张对这段历史和一代人的精神“遭遇”采取仰视或俯视的研究视角，而主张与之处于“互动”的、“同情”的和稍有“距离”的状态。这些年的思想史和文学史研究形成了多元的观念，它对于打破僵硬的历史认识框架，以“当事人”的身份“重返当代”，并深刻地认识当代无疑有积极的创意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某些负面效应，比如对历史的冷漠，对人精神实质的疏离，这种后结构主义式的非人文态度是当代文学及思想的研究浅尝辄止、无法真正深入的根本原因。这些警惕显然不是无益的，因为它可以避免研究者的人文心态陷入低迷和鄙俗。

除此之外，我以为不仅要加强对文学阅读活动中的“被动者”精神状态的考察，还应该开始启动对“主动性”和“同谋性”的研究工程。也许只有这样，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活动才能真正显示出一种创造者痛苦而欢欣的姿态。

□ 原载南宁《南方文坛》2000/06

~~~~~

【史海钩沉】

毛泽东“文革”后期“解放”和任用老干部情况简析

• 唐洲雁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而“文革”初期站在第一线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首当其冲。

“文革”前夕，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基本估计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政府、军队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在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才能把失去了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

“文革”开始后，林彪一伙和江青、康生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疯狂迫害和打击老干部，制造冤假错案，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使整个国家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察觉并揭露了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他们的权势，打乱他们的阵脚，最终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内心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他开始重新考虑过去所认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对老干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逐渐改变以前对一些老干部的错误看法和态度。“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他着重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问题，“解放”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所谓“二月逆流”，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初期对林彪一伙倒行逆施的正面抗争。现在毛泽东对它的正义性质作出肯定的评价，无疑是解除了几年来一直压在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次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谈话中他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在“文革”中，仗义执言的陈毅屡遭批判，是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典型代表之一。毛泽东出席他的追悼会，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事情，给了所有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从此以后，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申诉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他们有的要求解除监禁，出狱治病；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更多的则是要求弄清问题，作出结论。对于这些来信，毛泽东大多及时地作出了批示。据粗略统计，仅在1972年一年间，他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突出的如1972年底，他根据毛泽东对刘建章一案的批示精神，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对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都需列举出来，宣布废除，如有再犯者，当依法惩治。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理的100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如果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有关批示作些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这些批示直接揭露了林彪集团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如他在杨成武女儿来信上批示指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在廖汉生子女来信上批示指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第二，批示的范围不仅涉及到个人，

而且涉及到与个人相关的案件，触发了广大干部对这些冤假错案的进一步思考。如对罗瑞卿的批示涉及到“彭罗陆杨”一案，对谭震林的批示涉及到“二月逆流”事件，对杨成武的批示涉及到“杨余傅事件”。第三，批示的矛头不仅指向了林彪集团，而且指向了被他们搞乱的司法制度。如他在对林枫问题的批示中指出：“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对刘建章问题的批示中指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第四，对有的案件反复批示，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如对柴沫的问题，毛泽东先是由于1972年11月批示纪登奎、汪东兴酌处，一个月后又再次作出批示，并直接提出不应党内除名的处理意见。对贺诚的问题，他也曾两度批示，中间相隔达3年之久，直到贺诚获得“解放”为止。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批语。陈云在“文革”中被解除了除中央委员之外的一切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并在春秋季节到外地作些调研工作。毛泽东次日阅信后即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请中央商定”。8月3日，邓小平也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并写了一个较长的批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并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2月，毛泽东又3次同中央政治局等方面的同志谈到邓小平复出的问题。至12月22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决定的通知，使邓小平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的复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表明要结束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还必须依靠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四届人大重提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确认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意味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已遭破产。不久，邓小平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复出和领导全面整顿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感到无比振奋，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获得平反、“解放”的希望，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形成了继林彪事件之后又一轮较为集中的申诉。从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来看，这一时期“解放”干部的层面更加广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批示要求解决的既有过去几经申诉而未解决的案件，也有林彪事件之后发生的新的案件，其中包括康生、江青一伙蓄意制造的冤假错案。1975年11月10日，国防科委资料所干部张伯恒给毛泽东写信，对康生的打击、报复提出质疑，认为“绝对地肯定和绝对地否定都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尤其在肃反问题上更不宜先入为主地下结论”，康生“说我‘肯定与苏修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结论式文字，尚无充份根据，最好不要这样写”。毛泽东阅后将此信批交汪东兴进行处理。第二，批示应予“解放”和任用的人物除一些党政军高级干部外，还包括像华罗庚、乐天宇、姚雪垠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涉及林彪一案的普通工作人员。1975年6月24日，一位原在林彪处做保健工作的医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自“九一三”事件后参加学习班，至今已近4年，尚未作出正式结论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明确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分配工作”。对涉嫌林彪一案的其他人员，也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第三，批示涉及的领域不仅有党政军各大系统，而且延伸到文艺、教育等部门。突出的是对“周扬一案”提出了“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

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的处理意见。周扬在“文革”初期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因此而受到牵连。自毛泽东7月2日作出上述批示后，不出半月，专案办公室即递交了处理情况报告。报告中讲到，此案被关押、监护的人员，均已释放，其中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等20人被“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第四，与林彪事件后对一些人物或案件的批示内容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批示的态度更为明确，内容更加具体。如对贺诚的批语，1972年写的是“我意应给予工作”。1975年则进一步指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由此他还联想到军队卫生部门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傅连璋的冤逝，感慨万千地写道：“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解放”老干部，其目的是为了任用老干部。因此1975年前后，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回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突出的如叶剑英担任了国防部长，余秋里担任了计委主任，谷牧担任了基建委主任，周荣鑫任教育部长，万里任铁道部长，张劲夫任财政部长，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还同邓小平一起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共同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不仅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积蓄了干部力量，作好了组织准备。后来，正是他们这样一批在“文革”中历尽磨难、坚持抗争的领导干部，在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地总结历史，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 原载《党的文献》1998 / 02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